

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約前 145~前 90 年），卒於公元前 90 年，55 歲終。字子長，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漢武帝時任郎中、太史令、中書令，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曆代傳頌。

生平

司馬遷，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蹟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 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卒於公元前 87 年，48 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 10 公里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 10 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 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游，足蹟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元封三年（前 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在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曆代傳頌。

繼父志，任史官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去世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元封三年（前 108 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顛項曆》，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司馬遷的祖先並不十分顯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職。但是司馬遷和他的父親都以此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們

爲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着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司馬遷的父親病危時，拉着兒子的手，流着眼淚對他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這一番諄諄囑托極大地震動了司馬遷，他看到了父親作爲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着頭，流着淚，悲痛而堅定地應允道：“兒子我雖然沒有什麼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願。”

司馬遷做了太史令以後，就有了閱讀外面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爲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着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一直記得父親的遺志，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 104 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直言受宮刑

天漢二年(公元前 99 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

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被迫投降。

司馬遷

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漢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後聽說他卻投了降，憤怒萬分，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爲李陵辯護。他認爲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痛恨那些隻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他對漢武帝說：“李陵隻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

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二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漢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摺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司馬遷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兩黃金贖罪，二是受“腐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麼多錢贖罪。腐刑（即成為太監）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覺得自己如果就這樣“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無價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司馬遷頓時覺得自己渾身充滿了力氣，他毅然選擇了腐刑。面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 91 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三年。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着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

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編輯本段人物評價

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一部輝煌的中國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讚歎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一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台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麼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一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一些認識，這是一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麼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係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緝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一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繫和區別：因有聯繫，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麼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係，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准書》

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一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一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准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一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准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一些世儉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一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資料來源：中文百科在線 大家藝文天地轉載